

第一章

保留本民族的“我”

打量一下自己

想一想：

你是什么人，

你身在何处，

要到何方？

——欧玛尔·海亚姆

“按计划方案规划民族”的幼稚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只是因为 20 世纪的历史中，极权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错误，而且还由于人们已认识到了一个基本事实：民族，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其发展的可控性是具有社会生物学上的和文化上的限制的。把一个民族当作蘑菇来培育不但无益，也是不可能的。而且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往往胜过某些通用的药方所可能产生的效力。有句有名的俗话，其意思是说，对于某个人是好的药方，对于另一个人就可能致死，对于普遍适用的“药方”，要保持健康的民族主义的怀疑态度。

但是，在民族的范畴中，必须认识到共同的发展趋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和必要的。否则，就不能确定国家发展的共同逻辑。

* * *

有鉴于此，就会明白，为什么本书如此大量关注文化战

略问题。须知，我们自己的自我认识问题是我们制定民族国家政策的基本条件。

我们应当承认，一方面是内部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是文化方面受到的外部干扰，二者影响了哈萨克民族的文化理想的整体性。

如果我们无所作为，运动着的历史本身将会使我们分崩离析，因为哈萨克民族内部各种各样的“文化岛屿”将在客观上被拉向其他引力中心。绝不能小看这个问题的意义。因此，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形势进行文化的分析，专家们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想讲的是一个政治家的观察。

* * *

当我们谈到各种文化影响时，不管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会陷入被动的消费者的境地。我想说的是，会陷入受环境驱使的境地，尽管这种环境具有全球性的意义。但是，要知道，除了这种环境的要求之外，还有我们正在构建的民族目标。而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差别。什么是更为重要的：听命于形势和环境，还是争取达到我们那些理想的战略目标？

这个问题提得并不准确，遗憾的是，问题就是那样由很多知识分子提出来了，而且不止是在哈萨克斯坦。这就是提出了“残破了的意识”的问题。现在正在把哈萨克民族意识

的目前状况固定下来，并提出要与名声不好的环境相提并论，也就是与外部和内部的压力相对抗。但是这样却忽视了民族意识的一个重大特征——它的发展能力。

民族意识的这个不稳定性、流动性给实际政策带来了不少问题。至少有三个不简单的问题。

第一，何种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事态发展中战略上是符合民族利益的？第二，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哪些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三，所期望的情景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性和实际可操作性？

因此，正确地提出问题应当有不同的表述：“在任何一种相当现实的形势下如何保留和发展哈萨克的民族特性”？当然，这是对这个任务的最广泛的提法。但是，当涉及一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着来自“运动着的历史”方面的危险时，又应该在怎样的范围内提出问题呢？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是不允许开玩笑或者犯错误的。我们应该面对危险本身提出问题。正像古人所说的：“这里是罗德岛，你就在这里跳吧”^①。

罗德岛是爱琴海的岛屿。这句话出自古希腊的寓言《说大话的人》。寓言讽刺的是一个说大话的人，他说他在许多体育项目上战胜了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得胜者。有人听了，就用这句话将他军。这里作者是用来讽刺那些在哈萨克民族问题上说大话的人。——译注

* * *

今天，对于哈萨克的人文科学家来说，没有什么任务要比在民族特性和急速变化的时代命运的相互作用中于这个宏大空间开辟道路更为迫切的了。这不仅是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个科学问题。因此，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要在学者们写出著作之前先提出预见，这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只是想阐述一下我们不仅会在文字创作形式上，而且更多地会在做具体决策时涉及这些问题的实质。

今天，充斥脑海的都是一些在思考哈萨克民族在当代世界地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折中主义观点。一些人试图构建的是一些全球性的理论，其目的就是想在世界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寻找哈萨克的特性。

诸如把后工业化社会、各种文明的碰撞、自由主义的成功、新保守主义等这样一些全球性的变化，不考虑任何历史因素和地域限制地立刻应用到哈萨克民族身上。似乎我们这里今天没有比新保守主义更为重要的问题了！换言之，他们把哈萨克民族问题的范围不加批判地加以扩大了。

另一方面，也有那样一些试图，那就是想把哈萨克历史放在自己的独立王国里，冠以漂亮的但陈旧的意识形态，顺便说一下，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通过游牧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多棱镜来分析哈萨克问题，会比较恰当地缩小哈萨克

民族问题的范围。要知道即使是有意地把时代的挑战丢置一旁，那么哈萨克民族本身从来都不是封闭的、孤立的。她由于命运和上天的旨意过去就是对各种思想开放的，而且在开放中又善于维护自己的民族思维，绝不把民族思维只归结为游牧主义和传统主义。传统主义的“吹鼓手们”忘掉了历史的规律性，它表明，一些传统之所以会形成，恰恰是因为人们在历史中某个时候不愿接受新事物的缘故。

* * *

为了置身于“现实的范围”内，就必须摆脱把哈萨克人的历史和现代状况看得过于广义和过于狭小的概念。

这种对待问题的态度在这里至少有两个组成部分。第一，这是原本的历史组成部分。今天所使用的方法，可归结为把民族历史划分为传统的游牧社会、进入俄罗斯帝国范围、苏联时期和最后的独立条件下的哈萨克民族。

遗憾的是，简单化并不总能符合历史。是的，能把我们的传统历史只归结为游牧生活吗？今天这一点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疑义。不管是在远古时代，还是在哈萨克民族自己的起源时期，在哈萨克斯坦的疆土上都存在过发达的城镇体系，因此，不能这么单一地阐述我们的过去。而且很多地区都有多个世纪的定居传统。最后，对游牧生活本身的阐述也不像 10 年前人们认为的那么单一。因此，我们在评价这么漫长的

民族生存时期的哈萨克的历史时，应当摒弃一切陈规旧套，应该客观地去思考传统的哈萨克社会有哪些特点体现了民族的现代面貌，这种持续了多个世纪的影响的特点表现在哪里。

对哈萨克民族生存的所谓殖民时期和苏联时期的问题，也需要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问题不是在确认一些老生常谈的明显话题，如说不仅沙皇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而且苏联也不是天堂。问题是在另一个方面——是在民族历史的这两个时期在渊源上的共同性上。社会制度的更迭在很多方面强化了已经存在的趋势，使整个民族文化和民族制度的破坏进程增加了强烈的极权政治成分。

看来，为了把哈萨克民族作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民族社会体系来认识它的功能特点，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帝国殖民制度和苏联殖民制度在原则上具有的共同之处，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的原则差别上。

当然，在 20 世纪之初，在“二月革命”之后，有一个短暂的时期，那时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出现了彻底改变对宗主国关系的历史机遇。但是，众所周知，这个时期被十月革命结束了。没有必要把这一个和那一个时期理想化。不管在哪个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文化上征服哈萨克领土的一套典型方法。在 19 世纪出现的很多趋势，在 20 世纪取得了逻辑的结果。

使用以前的公式来评价我们民族的历史，对研究人员和方法学上的一些考虑来说，当然是方便的，但是，在存在各

种不同的机制和历史情况下，对整个殖民时期的一致性的理解，应能说清楚哈萨克民族命运中的许多问题。要知道，最近的“历史记忆痕迹”是特别有意义的，它们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对事物的评价和对世界的看法，其中包括哈萨克人的世界观。

最后，民族历史的最近十年意味着找回了一百年前丧失掉的国家性的那个七年，具有自己的内在逻辑，具有其在民族意识中不可磨灭的痕迹。这一时期除了法律、经济和政治上的创新之外，还导致了民族心理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使人们认清了自己民族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些心理变化的作用现在还没有充分揭示出来。如果以为所有这些变化只带有积极的色彩，那是把愿望当成了现实。

但是总的说，这些心理进步的趋向显然是积极的——哈萨克人以坚定的心理依据来把自己的民族看做是世界历史中独立自主的主体。几个世纪以来对自己的民族前景的感觉的丧失，使民族性格遭到了破坏，发生了变型，迫使哈萨克人民的天才子孙和领袖想方设法来摆脱可诅咒的历史陷阱，当时为了保存民族的生存，就需要进行历史性的妥协。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哈萨克人终于重新获得了一个自由民族的生气勃勃的气息……

* * *

另一个对待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的要素是，必须十分注

意评价对哈萨克草原的文化影响。

两百年的文化“接种”，导致草原和周围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图像变了形。似乎哈萨克人只不过是某个文化半岛的一部分，在南面、东面和西南面它都被没有文化的海洋冲刷着。而草原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仿佛就是来自北面的文化创新向南面逐步扩展的历史。

这个不正确的说法很久以前就在大陆和世界范围内被克服了，今天对任何一位文明的学者或者政治家来说，只有无教养的人还在发这种议论。然而涉及哈萨克斯坦，这类“文化学”的某些残余仍然是常见的现象，而且最令人惊异的是，这些现象常来自当地的政治学家。时而能听到一些狂叫，说什么现在可以完全割断与过去的宗主国文化的联系了。

伟大的俄罗斯文化和它给予哈萨克人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不附带任何条件和不打任何折扣的。我并不拥护那些很容易就认为自己的见解已成熟的人的看法，这些人昨天还在写称颂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大部头专著，而今天却已把来自北方的一切都加以唾弃。这些反复无常的人，同那些土生土长的缺乏头脑、丧失了记忆的曼库尔特之流相比，同样令人讨厌。

这里所指的是另一个问题。所指的是，哈萨克草原和哈萨克城市曾是南方和北方、东方和西方伟大文化进行对话的交叉处。这种对话是经常在进行的——从巴布罗夫到别伊巴尔斯，从叶利图米什到瓦利哈诺夫。哈萨克文化，像我们突

厥祖先的文化一样，一直是融合组成的，并不能归结到一种单一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民族天地”的精神基础的探索，将会开拓广泛的领域，这不是由国内那些聒噪者的士官指挥棒或者主观意志所决定的。

只有那种极其缺乏教育的人，才连一般的常识水准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哈萨克土地是欧亚地区的一块有巨大文化创造的土地，从军事技术到房屋建设和牲畜饲养，从独一无二的冶金术到卓越的文学创作的纪念碑都有。没有同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的丰富内容的长期接触，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这里，在中世纪哈萨克斯坦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亚萨乌伊学派的神秘主义者、不但为商品而且为萨迪和鲁米的无与伦比的优美抒情诗开辟了道路的长着棕色胡须的波斯商人、威武的成吉思汗军队和庞大帝国的高官都成了永恒的过去，他们甚至都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这块土地交融了多少文化，它自己产生了多少文化影响，这是有待发现和考察的问题。但有一个事实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哈萨克草原的文化是极其复杂的、多层次的和具有深刻历史传统意义的现象。只有抱这样的态度才能使我们准确地理解，在文化认识范畴中什么是“哈萨克的”，这才是认识民族行为领域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区域。

* * *

对民族未来和对我们有可能保存民族的“自我”这一点

持乐观主义态度，这不是制造又一个视觉上的幻觉。我们是有产生这种乐观主义的严肃依据的。

第一，尽管有许多压力和变型，传统的生活方式还是“保存”到了 20 世纪初，这有利于保留强大的民族文化意识。形象地说，我们不同于其他许多民族，没有把民族历史特征中的潜在的、下意识的那个部分剔除掉。第二，哈萨克人没有同其他民族大规模融合。至少对在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来说，同化模式不占主导地位。其原因有很多，但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因素在民族自我意识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第三，建立了具有国家的一切特征的国度，这具有强大的心理共鸣，极大地改变了哈萨克民族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识。第四，由于民族遗传上的年轻和人口结构上的年轻，哈萨克人具有旺盛的“民族能量”的储备。最后，哈萨克人具有纯数量关系上的“规模”，以便在当代世界上作为一个当之无愧的民族成功地生存下来并发挥作用。

* * *

如果在更具体的层面上提出问题，并不去考虑纯外部的影响，那么，民族行为的领域是由三个因素决定并由这三个因素构成的。

这首先是民族整合和民族分化的机制。哈萨克民族的内部分化几乎总像造物主的鞭子或历史的鞭子，大大限制了哈

萨克成为国家的机会。自然，现代的分化机制与历史上的、人民记忆中的上千个显著的事例有些不同。但是，在这里，重要的不是为哈萨克的长期病症寻找历史借口，而是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分化趋势与同化趋势的斗争是民族行为的重要方向。发展哈萨克的内部整合机制、制度和价值观是一项重要任务，其重要性不亚于军事建设或对外政策机构的建设。

再说，作为哈萨克民族团结基础的主要思想结构在总体上是相当明确的。这就是保存和发展独立的国家。这就是发展作为国语的哈萨克语，使之真正发挥功能。这就是哈萨克斯坦的领土完整。最令人惊奇的是，按历史尺度来看我们只是在昨天才取得了独立，可是日常意识中人们对待这个事实就像对待某些已有几个世纪之久的事实一样。哈萨克斯坦的独立、领土完整，取得现实的经济独立、军事独立和信息独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长期过程，需要民族全体力量的共同努力，这种认识应当成为每一个哈萨克人的基本常识。

最后，在实际意义上大家都清楚，政治思想不可能“悬在空中”。在哈萨克民族的所谓“火车头集团”中，对自己在这种民族组建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应有明确的认识。我已经谈到过哈萨克知识分子在民族精神的生产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要知道，这不仅涉及创作知识分子甚至涉及科技知识分子。

在我们面前，存在着对民族利益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历史人物的范例，这里有卓越的历史活动家、真正意义上的国

务活动家，他们在 20 世纪初就提出了哈萨克国家发展的目标。对于历史不仅要根据取得的成就来进行评价，而在我们这个世纪，对历史与其说要根据成就，不如说要根据民族精神的突破来进行评价。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在 20 世纪初由“阿拉什”的活动家们开拓出来的民族行为的领域，在世纪末得到了拓展。

* * *

《圣经》中约夫所遭遇的灾难成为被人常常用来说明某个人遭受不幸的例子。但在世界文学和神话中，大概很难找到一个形象能用来说明一个在几百年的时间中遭受了各种不幸，但都没有垮掉，而是站立起来，建成了自己的国家的民族。

如果不从赫赫有名的“夜间闪光”或者对“文明草原”的田园般的描述来思考哈萨克的历史，那么有一系列现象会让人吃惊。即 18 世纪发生的对哈萨克人口的可怕打击和 20 世纪发生的集体农庄化、在殖民化压力下对国家的破坏、对民族精英的不断清洗、文化方面遭受的不可弥补的损失、部分哈萨克居民的边缘化、哈萨克民族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哈萨克人遭遇的知识悲剧和情感悲剧，所有这一切看来应该会导致心理上的垮台和民族家园的瓦解……

但是，正好相反。哈萨克人是伟大文明的继承者，能够

使民族的“我”跨越所有的历史悬崖和深渊。而且不但能跨越，不但能保存，还能够扩大。

这是偶然的吗？一般说，在缺乏足够的论据时，在做历史解释上常要诉诸神秘论。但我们没有任何必要来诉诸神秘的力量。保存“哈萨克自我”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是因为坚定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上的。

* * *

第一，哈萨克民族是在几百年的过程中形成的。他们不是在什么殖民化或者被征服过程中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哈萨克人的历史活动地域非常广泛，根本就没有局限在第一个哈萨克汗国组建时的范围之内。哈萨克人在历史上的稳定性和对其民族起源地的眷恋，在我们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起过巨大的作用。地球上未曾有过什么力量能迫使整个哈萨克民族离开过这块土地。无论是在人口、移民还是在文化意义上，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力量。

在我们的历史上，不仅有第七代之前我们世世代代的祖先，还有把哈萨克草原的生活方式带到印度河和尼罗河河岸、伏尔加河和顿河河岸的人……对哈萨克精神的这种历史多维性和远见性，目前评价还不多。然而，在人民意识的深处，这种民族精神一直以某种原始形式存在着，并发挥着它的作用。

第二，尽管存在着严酷的社会文化压力，任何人都不能摧毁民族文化的再生机制。这种文化存在于哈萨克的文学和音乐，民间口头创作和绘画中，哈萨克民族深刻而奔放的精神还体现在伟大诗歌创作的和谐韵律中，这不仅仅再现出了民族意识的特点，而且在语义学上扩大了民族意识的范围。因此，当代哈萨克人的文化领域甚至要比世纪初最为先进的同部族所有的文化领域更为深刻和广泛。反映民族精神的著作始终存在，这些著作在极权主义下表示忠诚的刻板公式盛行之时常常是不引人注目的，但有时会以它的民族能量唤醒沉睡的时代（杰出的哈萨克历史学家 E. 别克马哈诺夫的著作）

第三，哈萨克人高度的民族同一性。哈萨克人长期以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宗教的同一性和民族的同一性。哈萨克人对自己民族的看法，对自己民族的态度稳定性，确实令人赞叹。回忆一下如下的简单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是苏联时期惟一这样的一个共和国，即我们的人口比重在某些时期几乎占不到共和国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即使在这种条件下，绝大多数哈萨克人在选择自己的民族属性时从来不表现犹豫。因此，我绝不同意我们的悲观主义者关于哈萨克民族特性已经模糊的说法。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充实这个特性，除了民族凝聚起来的那些基本因素外还要以现代的内容加以充实。

* * *

民族意识的某些特点也能说明哈萨克世界观的奥秘和活

力。哈萨克人的精神世界多半是在口头诗歌传统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这个对许多当代民族来说难以理解的诗歌化了的世界，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远远超出了艺术题材和情感认识本身的范围。它本身充满了巨大的理性因素。因此哈萨克的诗歌创作具有极大的认知潜力。这种创作几乎总接近于自发的哲理思考的形式。

哈萨克草原上的诗歌从来都不是草原歌手独有的造化，它滋润了哈萨克文化躯体的所有细胞。

口头民间语言所起的巨大作用对于认识哈萨克人的文化整体性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不是日常交流层面上的生活语言形式，而是人类交往的创作形式所特有的悟性的语言形式。发声的语言成了“哈萨克精神”进行生动的创作的形式。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在几百年的长期过程中，人民的绝大多数，而不仅仅是它的上层精英，成为自己独特精神的创作者。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在内容上真正民主的，在实质上对哈萨克世界观特色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种现象。

由此也产生了哈萨克文学语言的民主主义和它令人感叹的警句。由此也产生了哈萨克语言的混合主义，它是不遵守按专业特点进行分工的刻板规律的。

民间的歌谣、口头的民间创作，经过许多大诗人和成千上万无名作者的传播和加工，成了一种特殊的媒介，弥补了群众教育机构的缺乏。千百万哈萨克人的这种语言创作，也